

伦理重建、信任重构与乡村现代化建设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再反思

郭占锋 蒋晓雨

摘要：梁漱溟认为文化失调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他以乡村本位的主体性建设为切入点，深入挖掘乡土社会传统伦理文化资源，以此培育新礼俗，型塑新的关系联结和社会整合形态。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以伦理重建为逻辑起点，以信任重构为动力机制，二者都意在以己为中心，推己及人，形成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连续统。实践中两者相互嵌入，形成纵横交织的关系网络，共同促进乡村现代化建设。在现代化视角下，梁漱溟这一思想蕴含着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发展思路、理性设计与感性实践相结合的实践过程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启发我们在当下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建设中要对农民主体性的培育、乡村伦理资源的挖掘以及整体性发展观的型塑做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伦理重建 信任重构 乡村现代化 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23)11-0047-13

DOI:10.19624/j.cnki.cn42-1005/c.2023.11.005

一、问题提出

一直以来，讨论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大多离不开“乡村成为问题”或“成为问题的乡村”^[1]两类说法。乡村成为一个问题域，可追溯至民国时期，随着自然灾害与外来工商资本入侵的双重影响，导致传统小农经济崩溃、农民陷于穷困、农村社会秩序混乱。一些有志于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知识分子，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开展了各类乡村建设运动。这些运动为乡村建设累积了重要经验，同时，乡村作为一个研究单位与问题领域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乡

之间不均衡的发展进一步暴露了乡村发展的问题，各类乡村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议题。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些问题只是社会转型背景下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渡阶段，乡村有一套自己的调节方式和应对策略；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乡村问题最后会使村落终结、乡村消亡。

不论是村落转型论抑或是村落终结论，都是基于经验事实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认为，究其根本，“乡村是否成为问题”最为重要的是农民主观上是否有对问题的自我认知。当前乡村成为问题确实是很多农村居民所体会到的事实表征，在某些具体问题中他们常常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原有的处理村民关系的行为惯习已无

法适应新的环境。频繁的人口流动以及外来资本的进入,村庄原本稳定的社会结构受到挑战,连同着传统的社会秩序与农民的心理结构均发生了改变。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作为建设主体的农民,若是他们不能很好地认知问题并解决问题,那么乡村建设便就只有其形而无其意,无法形成一个稳态的培育机制。然而,要如何让农民去认知问题,并形成具有主体性的长效解决机制呢?我们可以反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将对农村问题的认知追溯到梁漱溟所谓的“文化自觉”上面来。他以伦理重建作为解决文化失调问题的切入点,以新礼俗启发乡村居民的新认知。信任重构则是其乡村建设的动力机制,以信任促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系统间的合作发展,并最终达到改造社会、国权可立的建设目标。整个过程亦可称之为从文化自救到文化自觉的社会实践^[2]的典型,梁漱溟这一思想体系对当下的乡村建设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二、研究回顾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是推动本土化的社会学思想从理论建构到走向实践的初步探索,对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与乡村建设行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学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是从文化角度对乡村建设理论进行整体性的论述。艾恺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儒家的现代化实践^[3]。梁漱溟最早厘清“秩序”观念的边界,发出了重勘现代儒家秩序观念的先声^[4],面对儒家秩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他强调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的社会基础^[5],并以此为切入点,建构了系统的乡村建设思想。这一思想跳出了单一的现代经济技术支配的发展逻辑和国家治理主义的逻辑,尝试在乡村建设实践中找到中西方文化的契合点,建立新的乡村社会秩序。从其思想建

构的逻辑层次来看,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是以儒家思维模式为基础,建构了政治问题的解决、经济建设、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社会理性和向上的精神五个逻辑递进的层次^[6]。也有学者从整体系统的视角分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文化失调”“组织再造”和“乡村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7]。

二是从新礼俗建构、组织建设、教育发展等核心要素出发解读乡村建设理论,并进行拓展性研究。李春^[8]、吴飞^[9]、马飞^[10]等人从新礼俗建构的角度出发,认为梁漱溟在理性基础上建立的新礼俗与教化、民族精神培育有着紧密的关联,新礼俗的建构以改变社会结构,并达至用社会来统摄政治的目标,是现代治理模式的理论探索。马良灿^[11]、李善峰^[12]从乡村建设中的组织建设入手,系统分析了乡土重建的组织基础,并将梁漱溟重建乡村团体组织的理论构想和本土化实践与乡土治理体系的建构相结合,反思其对当下乡村“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建设的借鉴意义。察应坤^[13]则具体以乡村建设中的“菏泽模式”为例,探讨了以乡农学校为载体的基层权力组织的再造,推动了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魏峰^[14]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梁漱溟等人乡村教育思想与实践,认为系统化、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对当下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是将梁漱溟与同时代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几位思想家进行对比研究。徐勇^[15]分析了毛泽东、梁漱溟和费孝通乡建思想的异同,发现其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现代化进程不能以牺牲和遗弃农村为代价,都强调乡土重建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开发、挖掘农村和农民的内在潜力,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农村,身体力行进行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从中挖掘和寻求解决乡土重建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而差异性在于:毛泽东开展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制度革命,梁漱溟从事的是知识精英的文化改良,费孝通进行的是草根工业的乡村再造。李焯、刘祖云^[16]将文化、制度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性框架,以梁漱

溟、晏阳初和费孝通为中心,系统分析了三位学者从事乡村建设的不同归因机制与路径选择。张浩^[17]则是从费孝通的角度来解读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思想,两人从分歧到认可,实现了“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观念转变。

综上,已有的研究对解读梁漱溟思想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仍有些许不足。首先,仅仅停留于乡村建设实践内容及其逻辑关系的解析。其次,从文化角度入手,探讨乡村建设以儒家思维模式为基础,但却缺乏对传统乡村行动伦理的深入解读。最后,研究视角都较为宏观,未能深入探讨乡村建设的深层动力机制。基于此,本文将以前乡村居民的伦理重建作为分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信任重构作为乡村建设的动力机制,深入分析在伦理培育基础上所建构的各种信任关系是如何搭建了纵横交错的网络,将个人、团体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微观到宏观、自下而上达到改造社会的目标,并从现代化视角下,对梁漱溟这一思想进行审视。

三、伦理重建与信任重构:梁漱溟乡村现代化建设的设计思路

民国时期,政治不稳、战乱频繁、经济匮乏,造成了中国社会秩序瓦解、社会结构崩溃、社会关系失调。梁漱溟将其概括为文化失调,正是这一问题制约着中国现代化实践。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聚焦于上层建筑的革命或改良来改变这一现状,但都以失败告终,社会危机愈加严重。梁漱溟对已有的改革模式进行反思,基于中国社会基础的再造来考量农民问题^[18],并将解决中国整体问题的重心放在乡村建设上。正如梁漱溟所说:“我的问题虽多,但归纳言之,不外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两类,……所谓中国社会问题是以中国政治问题为中心,我今日所提倡并实地从事之乡村建设运动,即是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一种烦闷而得来之最

后答案或结论。”^[19]这个答案也即“要先培养新政治习惯。而新政治习惯的养成,须从小范围入手,因此才注意到乡村”^[20]。梁漱溟将视野聚焦于乡村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乡村社会结构稳定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如何培育现代化的行动伦理?这都是乡村现代化实践必不可少的认知前提。

(一)伦理重建: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

梁漱溟认为认识乡村问题必须要有整体性、系统性的视角,“我们则看乡村社会的内部,虽然不是全没有问题,然而乡村外面问题更严重——就是整个乡村的破坏,所以我们现在必须看乡村是一个整个的”^[21],乡村是一整个的认知单位,同时是一个行动单位。而且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村落社会也”^[22]。要理解宏观中国的文化,也必须从乡村入手,“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23],“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这便是‘乡村建设’”^[24]。在这里便可以看出,梁漱溟将乡村建设与文化复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他开出的救世之方中,嵌入中华文化深层次的伦理要素即是我们认识乡村社会的关键,也是维持乡村社会结构稳定的核心。而重建伦理则是营造关系联结的逻辑起点,以此培育出与现代化实践相适配的行动伦理。

1.“伦理”的传统溯源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自封建社会解体以后,由于周孔礼教启发的理性,以礼教代法律,以伦理代政治,以职业代阶级,以道德代宗教,把阶级国家融于伦理社会之中,导致了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兼国家,使中国不属于一般国家类型^[25]。梁漱溟由此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有分化而无阶级,无宗教而有“伦理”,如是散漫无纪、流转不滞、软和无力的人群社会^[26]。

在这一人群社会中,“伦理”一词有着丰富的内涵。梁漱溟在与西洋团体组织的对比中,认为伦理

即是伦偶,人一生下来即有与他相关的人,并且他的一生也始终是与人在相关系中^[27]。在传统儒家思想中,人生最基本的关系便是“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五对基础关系,以及孟子所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关系规范。潘光旦先生认为“伦”既从人从仑,而仑字又从亼从册,亼是合,册是分,自条理或类别的辨析言之是分,自关系与秩序的建立而言之是合,这便是社会生活的全部^[28]。“伦”在其中,既有平等之意,亦有等差之意。当“伦”深化为类别与等级时^[29],即儒家所讲的“亲亲”与“尊尊”所构成的一整个社会关系网,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明晰自己的职责。在传统社会,“五伦”就是中国的社会组织,离开了“五伦”别无组织,而且这样的社会没有个人的观念,组织也是以天然性配合而成的^[30]。

如果说“伦”是人们彼此相连的关系,那么“理”则指行动原则。有“伦”必有“理”,“伦”不同则“理”相异^[31]。“理”与儒家思想中的“礼”是相互契合的,礼而成俗,相喻而共守,成为人们之间关系的调节器,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为一个爱好和平且松散有序的和谐社会。礼所规范的是人人向内用力,互相以对方为重。虽然不能保障对方同样以礼待己,但自己仍必须恪己守礼,“自省”是中国伦理的精髓。同样,人们对不同关系的认知,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行动逻辑。

传统伦理的核心要素就是对“内部人”应该尽心,而对“外部人”则不必如此。家庭就是伦理体系中最基础的一环,正所谓“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32],以家庭作为界限向外推广发挥,以家庭恩谊推准于社会,以伦理组织起整个社会^[33]。也即是说伦理关系本始于家庭,乃后推广之于社会生活、国家生活^[34]。由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再到国家,伦理成为了传统社会组织构造的核心,维持着数千年传统社会只有周期性的治与乱,而无组织构造的

根本颠覆。

2.以关系联结为特征的伦理重建

以关系联结为特征的伦理重建一方面体现在从认知关系到增进关系上。伦理所维持的中国传统社会,在与西洋文化遭遇中,陷入了失调与混乱。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失调,就是这种破坏的主要表现之一。基于此,梁漱溟以乡约改造为基础建构新礼俗,塑造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所谓新礼俗,就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完全沟通调和成一事实,事实出现我们叫它新礼俗),不只是理论上的沟通,而要紧的是从根本上调和沟通成一个事实。当中国精神与西洋长处二者沟通的事实有了时,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实现,也是人类的一个新生活。”^[35]重建新礼俗,意味着既要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又要不断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两者相互磨合,相互调试。

于前者而言,作为对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的调节——伦理重建是新礼俗建构的应有之义,而在伦理相宜中认知关系并增进关系就是伦理重建出发点。以往伦理本位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认知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伦理关系也表现为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着^[36],彼此以对方为重,以维持关系的和谐。而乡村建设,仅仅满足于关系和谐的目标是不足的,与西方相比的弱势地位,需要激发出对伦理关系的增进,启发农民自觉,发展出一种更为积极的关系网络。中国人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要合不要分^[37],将散漫的农民联合起来,培育成进步的团体组织,推动关系组织化,使农民能够自觉地参与到团体生活中去。

践行尽性,追求人生向上是伦理重建的另一个重要要求。梁漱溟认为人类的可贵在于他不甘心于错误而要求一个“对”^[38]。“生命力量的激发”“人生的可能性”“伦理相宜、人情和洽”“最能增加生命的活动”是乡村建设理论中常常出现的词汇。

在梁漱溟那里,人生应当是为理的奔赴;就是你看你所应当做的你就去做,你将会继续扩充你的可能^[39]。伦理重建在这里更像是中国精神文化的复兴,通过乡村社会基层的日常生活实践去塑造一种伦理道德的新文化,并把这种伦理道德的实践性转化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整体实践,以实现整体的文化复兴^[40]。

践行尽性、追求人生向上,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中西方事实的调和,梁漱溟希望在传统伦理的基础上,建构一套新的人心秩序,为新社会塑造人心所向的伦理基础。由此,伦理重建两个方面——伦理情谊与人生向上,都旨在培育一种新的习俗、新的习惯,并形塑为一种新礼俗。这种新礼俗,并非走向一种新的正式制度,就像儒家思想的制度化一样,并非典章制度的部分,而是指向行动的社会结构^[41]。新礼俗就是乡村运动行为指南,是处理现代化社会各种复杂关系的行动原则,可称之为一种稳态的“行动伦理”。

(二)信任重构:乡村建设的动力机制

信任重构是乡村建设的动力机制,是一种情感动力,抑或是精神动力。梁漱溟认为中国古人之精神者,彼此相与之间,就存心言之,第一要件是“信”^[42]。“信”是区别于西洋社会理智计算的感性教化,维持着传统社会数千年来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果说伦理是外在礼俗的内化,并外显于人们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中的义务关系,它就如一杆标尺,丈量着人们的行为尺度,那么信任则是由内向外的情感表达,推己及人,与他人建立程度不同的亲密关系,是一种人心的向上、向善。

“信”是梁漱溟重塑人心秩序、改造乡土社会的核心要素。在梁漱溟那里,村庄是一个整体,而非由分裂的各个阶级组成,乡村里的人有一个整体的称呼就是“乡村居民”。所以,在乡村,信任重构超出了家庭本位的亲密关系和差等化的伦理义务,重在面向整个乡村社会。以乡农学校为载体,激发乡

村居民的主体性,以相互信任的社会情感,建构乡村共同体,培育团体与个人,知识分子与农民的信任关系,并在现有与经济、政治、教育的合作实践中,达至对整个国家从农业到工业、从农村到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路径的高度信任与参与,最后以社会之整合实现秩序重塑的目标。

1. 乡村内部信任机制的建立

信任的重建是一个由内而外的感性选择行为,彼此的信任或基于亲缘血缘关系、或来自长期的相处、或来自外在制度的保障,由此而结成一种稳定和谐的关系形态。在梁漱溟的乡建思想中,乡村学校为载体的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43],这一组织融合了亲缘血缘、长期相处与制度保障等多种元素,是培育乡村居民彼此间社会信任、凝聚内在发展动力的重要载体。一个完整的乡农学校组织,有学长、学董、教员与学众等四个主体^[44],前三者分别发挥着监督教训、行政事务和推动设计的作用,而学众就是以乡民为主体的学生,是乡农学校培育的对象。梁漱溟认为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可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西洋人的长处^[45],以培养乡村居民的政治习惯、推动农民的现代化转型。而且乡农学校真正发挥组织作用,就在于乡村多数人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均行启发,新政治习惯培养成功^[46]。那么,乡村内部信任机制是如何建立的呢?

首先,梁漱溟主张通过乡农学校来启发人的理性,促进个人之间的信任。这种理性是中国精神中对内在自我的反身性、反思性,是一种对行为的反思。具体到村学乡学、教员的教学中,主要是引导乡村居民意识自觉,并参与到问题的讨论之中,逐渐形成一种理性的修养。教员启发、教育乡民,人生是互依的——认识人生社会关系,由认识社会从而增进社会关系,渐渐由散兵游勇形成一个彼此依靠、团结共进的团体^[47]。从认识到增进的过程,正是乡村居民彼此间信任关系培养的过程。当

乡村居民以学生的身份,按照学校基本规定聚集于一处频繁交流与学习,这就使原有的散漫因交流逐渐变得紧密。

其次,传统儒家“亲亲”“尊尊”的思想在乡农学校的组织架构与设计原理中皆有所体现,推动着个人对团体组织的信任。一方面,“尊贤尚智”是梁漱溟多次提到的一个组织原则,学长、学董由乡村里贤能的士绅担任,梁漱溟眼中士绅的首要责任在于培养人心、教育地方。对师长的信任关系,就体现在不管是县政府,还在乡村学员,尊师都是不成文的规矩,而且为确保师者的尊严,乡农学校组织在设计时,不依附于政府,因其独立,方能实现地方自治之目标。另一方面,乡农学校组织,是基于血缘亲缘关系,组织关系建立在柔性的习惯上,是非寓于习惯,区别是非全靠情理^[48]。这种情理亦是信任不断重建的体现,以学长与学董之间的监督关系为例,在这里,大家有一种相喻而共守的习惯^[49]。对内里人情的讲究,尊敬人、爱惜人的处事态度,正是由内而外信任关系的建构。而且梁漱溟较早发现了习惯与团体组织之间的微妙关系,他对整个新礼俗秩序的设置都旨在规定出方向培养习惯,以不断增强乡民对乡农学校进而对乡村组织的认可与信任。

最后,信任重建还体现在拓展关系边界,推动外在关系内在化,从而实现乡村内部整体信任。拓展关系边界是建立在传统“五伦”关系的基础之上的。随着乡农学校在乡村土壤上根植,乡村居民面临的关系比以往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最为典型的是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何以建立?一方面来自知识分子的理想情怀。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完成东西方文明的沟通工作”^[50]。这一使命要求知识分子既要走出乡村,学习西洋文明,又要回到乡村,建设乡村。为了培养知识分子的乡土情怀,研究院中最重要的一个教学内容就是精神熏陶。学院中

各种训练最重要的部分是梁漱溟的理论和“精神”训练,它使学生了解乡村建设的方向,并转变其人生态度及日常生活习惯^[51]。知识分子在村学乡学的教学过程中,是长期驻村的。在与乡村居民相处的过程中,内在的道德约束与交往中形成的人情约束不断转化为知识分子的行为习惯,促使知识分子融入。另一方面需要乡村居民将外在社会关系内在化,对于乡村来说,知识分子是外来人,两者之间能够建立从陌生到熟悉的信任关系,很关键的就是乡村居民能够在传统“五伦”关系的基础上拓展自己的关系边界,包容与接纳这些于他们而言的“外乡人”。“将心比心”就是新关系得以建立的核心要素。中国文化传统在乡村居民的具体实践中,已经型塑了一整套完整有序的行动伦理,正是行动伦理以“感通”的方式连接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理解^[52],促进了乡村居民对知识分子下乡工作的信任,并有效型塑了乡村内部的信任机制。

2. 社会整体信任纽带的型塑

社会整体信任纽带的型塑一方面是以乡农学校组织为载体,建构整体的社会文化系统;另一方面是文化政治经济相协同,以信任合作统筹发展。于前者而言,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教员直接作用于整个大的社会文化系统,作为社会关系网络上的关键节点,联结着整个大的系统。学校教育将乡村居民都纳入到这个系统,通过教育以他力引生自力^[53],启发乡村居民的自觉,引导他们立志追求人生向上,并有意识、有计划地参与乡村建设当中。在这里,梁漱溟所希望达成的是一种社会信任,所有处于这个大的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个人,因彼此的关系联结,既有个体之间彼此的信任,也有个体对于整个文化系统的信任。从地方组织到社会系统,基于信任的有力联结,推动着整个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的重建。于后者而言,政治经济教育系统相协同,以信任合作统筹发展。合作达成的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贯穿在梁漱溟乡建思想的整个

脉络中。在他看来,乡村建设本身就是一种善业,一种非营利性的公共性行动,农民合作组织也即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组织^[54],这一组织综合了经济、政治与文化多个系统。

首先是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同。梁漱溟从整个中国工业化发展入手,设计了一条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叠加为推引,逐渐以合作的路,达于为消费而生产,于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中^[55],完成分配的社会化。具体到乡村经济,便是以合作社成立为载体,走合作之路以促进农业社会化。在梁漱溟看来,农业产业合作组织既立,自治组织乃缘之以立,则所谓村治也^[56]。从农业合作组织到村庄自治组织,正是组织的力量将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整合起来,相互协调推进乡村建设。

其次是政治系统与教育系统相协同。梁漱溟通过改革县政系统,以推动政府学校化,并更大范围推动社会学校化,从而将农村改造成为一个儒家集体主义思想的大学校^[57]。他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将儒家理想的圣贤之治与民主政治嫁接,设计了一种儒家式的民主模式,他称之为“人治的多数政治”,以此来作为新礼俗的政权形式^[58]。这一遵循着社会文化系统为主、地方行政系统为辅的运转逻辑,两者分工合作,使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得以调和。

最后是经济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的协同。在梁漱溟那里,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是以传统伦理关系作为基础,并不断整合进新的社会关系,以多维关系的信任重建为动力,重塑乡村社会组织。梁漱溟认为乡村经济发展出路就是散漫的农民,经知识分子领导,逐渐联合起来实现经济上的自卫与自足;同时从农业引发工业,完成大社会的自给自足,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构造^[59]。这一过程中,文化系统的教育功能便得以体现:用技术、知识及情感联动了知识分子与农民,搭建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共同参与到整个经济系统的建设中,文化系统与经

济系统相互嵌入,将“建设寓于教育”^[60],最终助推乡土社会整体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三)伦理重建与信任重构之间的双向嵌入关系

整体来看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其定位并非局限于乡村,而是整个社会。他希望以社会之重建,来达至国权重立。也就是说在基层组织的重组完成之后,同样的过程将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推进,直到整个国家实现社会化和民主化^[61]。伦理重建和信任重构无疑都是从微观到宏观上将个人行为纳入到整个社会系统中去。从关系联结到社会整合,两者之间相互嵌入以理顺各种关系,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一起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1.以伦理之义为信任重构提供关系前提

伦理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中的逻辑起点。伦理之义古已有之,乡村居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稳态的“行动伦理”。面临西洋文明的冲击,传统伦理所维系的社会组织构造受到了极大冲击,连同伦理本身也逐渐式微,所以梁漱溟提出,伦理重建就是启发乡村居民的理性,从认知彼此之间的关系到增进关系,引导其立志追求人生向上。在这一过程中,伦理之义,意在让人人向内用力,这不仅是传统儒家文化中对自我地位和义务关系的反思,还是认知关系与增进关系的前提。伦理重建在梁漱溟那里,既外显于新礼俗的达成,又内化于人心秩序的重塑。外显于礼俗,是对乡村居民新的政治习惯的培养,是由外而内、潜移默化改变行为逻辑;而内在理性的觉醒让乡村居民主体性得以激活,使乡村居民意识到自身所面临的现实处境,以现实问题激发其解决问题的动力,引导乡村居民形成向上、向善的人心秩序。新礼俗与人心秩序将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行动结构与人生心态等予以指引。从个人到团体再到社会,基于礼俗而形成关系联结,为培育新的信任关系、形成由信任关系而来的社会整合提供了关系前提。

2. 以信任之情为伦理重建打造社会联结

如果说伦理重建是以培育新礼俗和重塑人心秩序为目标,那么信任重建则是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用文化教育之手段,培养乡村居民的信任自觉,不断拓展关系边界,将外在在关系内在化,以合作信任为导向,助推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相协同,最终促进社会力量的整合,共同致力于社会整体的改造。与伦理重建的设计路径相似,信任重构也是从个体出发,达至对团体,进而对社会整体的信任。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常常有对关系和谐与人和洽的表达,在这里,“关系”“人情”的深层基础,是一套基于家庭关系的伦理体系^[62]。家庭内部天然的基于血缘亲缘关系的信任,是最为基本的伦理关系,维持着家庭内部的和谐有序。在梁漱溟看来,在乡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仅家庭本位的信任是不足的,现代化建设所缺乏的科学技术与团体组织,恰恰是需要拓展传统信任关系的边界,将外在的与知识分子、团体组织的关系尽可能内化于乡村内部伦理体系之中,由此乡村内部可形成一个稳定团结的新共同体。而从乡村内部团体组织扩展到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运转,则需要建立更大的社会联结与社会信任,由社会信任形成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嵌入到伦理体系之中。信任与伦理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嵌入,将个体、团体与社会各子系统都整合起来,激活整个社会力量,共同推动新的社会组织构造的形成。

总的来说,伦理重建确定了以己为中心、推己及人的关系轮廓,抑或是关系秩序,这套秩序外显于新礼俗,规范着人们之间的伦理义务关系。新礼俗的核心在于“礼”。梁漱溟以儒家之“礼”为基础,认为礼必本乎人情;人情即是理性。故曰:“‘礼者理也。’非与众人心理很契合,人人承认他,不能演成礼俗。至于教化,则所以启发人的理性。”^[63]礼在这里因人而异,因情而异,因地位而异,需要个体考虑得体、恰当,有分寸,会拿捏。或者说,礼所关注

的不是它能否成为制度,而是它能否实现和谐。当礼俗这套社会秩序的维系内嵌于社会级差时,外在制度设置往往是多余的,尽管它有背书的作用,却未必是社会或组织实际运行的依据^[64]。

如果说伦理重建意在理清关系、型塑礼俗进而建立社会秩序,正如传统伦理教化人们,人人向内用力,最终维持了松散而和平的乡土社会秩序。而在现代化的发展潮流下,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构造崩溃、社会关系欠调整、社会秩序的饥荒^[65],究其根本,乃是文化失调之故,传统伦理文化所型塑的关系维持机制已经满足不了现代化发展要求。梁漱溟认为非要在认知关系、维持关系的基础上,去进一步增进关系不可,以个体之联结,达至社会之整合,而这一目标的实践是以信任重构为纽带的。以新礼俗为代表,伦理重建更多的是一种理性设计和关系规范,而信任则更多是一种感性选择和情感抒发。梁漱溟以乡农学校为载体,将乡村居民聚集于一处,启发乡村居民的文化自觉与人生向上,在学校场域的高度互动中,增进彼此关系,形成彼此之间的信任,进而型塑对团体的信任,乃至对乡村运动系统的信任。以信任为纽带,既实现了社会整合,亦体现了人生哲学。

四、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现代化反思

在现代化理论的孕育中,大多数学者对现代社会特征的描述呈现了一种总体性特征,即认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是理性化所促成的现代性^[66]。“理性”是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核,因理性思想的指引,形成了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基础上的国家社会制度的革新。

梁漱溟在中西方文化对比的前提下,深入反思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优势与局限性,他吸收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科学技术”与“团体组织”这两大进步的物质要素,又把理性思维融入其中。将理

性设计与感性实践深入结合,以伦理重建塑造新礼俗,以信任重构凝聚新整合。在整体系统的乡建运动方案下,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和村社自主性,希望走上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用现代化视角下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反思,可从人的现代化、理性设计与感性实践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以及社会的现代化三方面展开。

(一)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思路

现代化视角下,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思路。无论是伦理重建,抑或是信任重构,梁漱溟都坚持把乡村居民放在首位,以文化自救启发乡村居民文化自觉,引导其追求人生的向善、向上。这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路径不同,西方现代化发展依托于科学技术与团体组织,但是先进的技术与广泛的组织都服务于资本。梁漱溟认为这不是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现代化的发展应是以人来支配物,全在我们一意社会关系的调整增进,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矛盾,形成一社会意识以为主宰^[67]。

在具体的现代化发展思路设计中,由伦理重建和信任重构所形成的关系联结与社会整合,交织成一个大的紧密关联的社会关系网络,将参与到乡建运动系统的人们纳入其中,而承接的载体便是乡农学校。潜移默化的学校教育以及知识分子循循善诱的引导,乡村居民逐渐经历一个由被动吸纳到主体性参与的过程,科学技术与团体组织也都是以服务于人的发展为前提。在这里,乡村居民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结合是整个乡村运动系统得以运转的前提。知识分子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教化引导,引导乡村居民认知关系并增进关系,个人之间、个人与知识分子之间以及个人与团体之间双向互动,以形成亲密关系。对所有加入到乡村建设系统中的人,逐渐激发其主体性,慢慢培养出有效参与的政治习惯,并进而形成行动伦理,以适配现代化政治经济发展要求,最终走上一条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

的现代发展道路。

(二)理性设计与感性实践相结合的实践过程

以乡农学校为载体,建构大的社会文化系统,并规划出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之间相协同发展的思路,体现了梁漱溟对乡村建设运动精细化地理性设计。虽有了制度化的设计,但在具体实践中,梁漱溟却希望用一套弹性的新礼俗,抑或是说行动伦理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以农民之自觉、知识分子之情怀以及社会运动之思潮来助推整个乡村建设运动顺利进行。理性设计与感性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到乡建运动中,就是制度建设与伦理精神之间的选择问题,两者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同方式。

伦理精神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核之一,维持着传统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潘光旦先生认为在儒家思想中,尽管孔学中的仁义忠孝是模糊不清的,可“伦”字的含义却是清晰可辨的,它可以连接中国社会思想与西方近代以来社会科学所讨论的各种内容^[68]。“伦理”所具有的中西方文化联结的特质,被梁漱溟较好地用在了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伦理”在梁漱溟那里是乡土社会的社会基础,他在此基础上规划了乡建运动的组织设计、实践内容与运动方向,这都是充分尊重乡村主体性而设计出的弹性规则,更多的是在强调行为引导与习惯培养。从个体到团体到社会,自下而上、由散而集,由此形成一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配的新礼俗,作为新的调节社会关系的方式。

在这里,具有法律、协议以及契约等特征的制度规范恰恰是梁漱溟不愿过多吸纳的。制度建设无疑是更为理智的激励制裁手段和更为标准化的评价体系。然而,梁漱溟认为这种严格的制度建设,不能启发乡村居民内在的生命活力,无益于乡村主体性的培养,因此梁漱溟更倾向于前者。尽管伦理和信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没有让乡建运动力挽狂澜走向成功,但不可否认伦理和信任的重建

对当下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目前制度话语主导的乡村建设中,一旦片面强调理性规划而忽视了农村社会的感性存在基础,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脱离实际的空泛理想中^[69]。因此,我们不可忽视对“伦理”“信任”这类的社会性资源进行挖掘和乡村主体性的激活。

(三)以实现社会现代化为发展目标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以实现社会整体的现代化为发展目标。他认为现代化是追求社会整合而非阶级对立,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属性,恰好弥合了西方社会现代化发展中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的张力。在乡村建设的路径设计中,梁漱溟在微观上始终把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讨论,在宏观上也始终秉持着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分析视角,他以文化失调作为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起点,以中国社会要合不要分作为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深入挖掘传统的伦理文化资源,又以情感激励人们建立信任联结,希望通过“乡村居民彼此之间的信任—乡村居民对知识分子/团体的信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子系统之间的信任合作”,从而形成大的社会信任和社会整合,以实现社会现代化。

在这一过程中,梁漱溟系统地讨论了中国社会在当时面临现代化的过程中,“失调”和“调和”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失调与调和并非二元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传统儒家伦理的调和性功能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一调和性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只有治乱周期,而无制度革命,关于转化和统一的思想用和谐的泛道德主义取代了斗争。按照我们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理解,他希望基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寻求中西方文明的事实调和点,最终走上一条有别于西方且更为合理的现代化道路。

五、结论与讨论

在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中,伦理重建与信任

重构统合于整个大的社会改造过程中。以伦理为基础的新礼俗,意在塑造一种新的适合乡村现代化建设的伦理体系。而信任重构无疑是乡村建设的动力机制,它从个人到团体再到社会,编织了一整张大的社会联结与社会信任之网。伦理重建与信任重构相互嵌入,都力图整合社会力量,推动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并促进乡土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现代化视角下,我们看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本质是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思路、理性设计与感性实践相结合的实践过程和以实现社会整体现代化为发展目标的统合。

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我国经历了从“中国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演进和道路探索^[70]。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家们,力图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以扶大厦之将倾,挽民族之危亡。梁漱溟乡建思想中最为可贵的一点是:发现了中国社会的真实性;发现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力量是在基层^[71]。虽然他们大多以失败告终,但其中不乏理论思考和路径探索。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伦理和信任也是思考乡村现代化建设问题的重要因素,激发了我们对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主体性培育、乡村伦理资源挖掘以及整体性发展观型塑等方面的思考。

农民主体性的培育贯穿于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始终。他希望乡村现代化建设要牢牢坚持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72]。这与现代化本身的特征息息相关,现代化是指个人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一种复杂的、技术先进的和不断变动的生活方式的过程^[73]。这一过程中,人的现代化居于核心地位。不论是伦理的重建,还是信任的重构,梁漱溟的乡建思想将以乡村居民为主体的社会关系调整作为核心线索,旨在培育乡村居民的政治习惯,启发其自觉地参与到乡村组织中来,走一条内生性的乡村现代化道路。梁漱溟所思考的是,

如何在保留传统理性的前提下又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农民主体性的培育无疑是其中关键一环。这对于当下乡村现代化建设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乡村现代化建设所推动的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和谐,而且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和善。所以,建设的主体归属自然是农民。一方面,农民的行为伦理是保留乡土性、培育主体性并激发内生性动力的社会基础。农民主体性与组织、技术等载体关联起来,能够找到主体性得以发挥的空间,指引农民的建设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主体性的激发在于乡村社会各类资源的整合,通过建立“伦理”、“信任”基础上的关系联结,以激活乡村社会的各方面力量,从关系联结到社会整合,将是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社会性资源。此外,当下的乡村建设应当形塑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发展观,在各个子系统协调运转的过程中,实现社会整体现代化。

注释:

[1]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2]谢君君:《从文化自救到文化复兴: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现代价值》,《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2期。
 [3][22][51][57][61]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第124页,第176页,第178页,第125页。
 [4]高瑞泉:《儒家秩序观念的现代重勘:以梁漱溟为中心的讨论》,《江海学刊》,2019年第3期。
 [5]柴文华、赵菲菲:《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中西文化观》,《江淮论坛》,2019年第5期。
 [6]徐庆文:《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逻辑进路及

其当代价值》,《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
 [7]郭占锋、黄民杰:《文化失调、组织再造与乡村建设——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论起》,《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8][47]李春:《以理性构建新礼俗社会——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研究》,《孔子研究》,2021年第6期。
 [9]吴飞:《梁漱溟的“新礼俗”——读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0][58]马飞、黄晗:《梁漱溟的新礼俗思想:一种儒家式现代化治理模式》,《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11][54]马良灿:《乡土重建的社会组织基础——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社会学转向》,《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期。
 [12][46]李善峰:《乡村团体组织重建的“本土化”尝试——以梁漱溟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为例》,《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13]察应坤:《基层权力组织的再造——民国乡村建设实验的“菏泽模式”》,《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14]魏峰:《文化人类学视角下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以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为例》,《教育发展研究》,2022年第18期。
 [15]徐勇:《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的探索及其比较》,《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15期。
 [16]李焯、刘祖云:《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回眸、反思与展望——以梁漱溟、晏阳初和费孝通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22年第2期。
 [17]张浩:《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费孝通看梁漱溟乡村建设主张》,《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5期。
 [18]王宇雄:《论二十世纪前半叶毛泽东和梁漱溟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 [19]梁漱溟:《乡村建设文集》,邹平乡村书店,1936年,第14页。
- [20][24][35][50][59][60][7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8页,第613~615页,第278页,第481页,第495页,第472页,第562页。
- [21][55]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3页,第579页。
- [23]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邹平乡村书店,1936年,第20页。
- [25]李善峰:《一个现代国家建设的系统方案,载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88页。
- [26][27][34][36][37][38][39][42][43][44][45][48][49][53][63][65][67]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第158页,第107页,第107页,第217页,第116页,第119页,第105页,第160页,第220~225页,第160~161页,第230页,第230页,第239页,第181页,第23页,第392页。
- [28]潘光旦:《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4页。
- [29]翟学伟:《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社会》,2016年第5期。
- [30]张东荪:《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436页。
- [31]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 [32][52]简帛书法选编辑组:《郭店楚墓竹简·六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 [33]夏天静:《梁漱溟新乡村组织的伦理探析》,《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5期。
- [40]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90~493页。
- [41][64]翟学伟、张静、周雪光、周飞舟、渠敬东、应星:《关于“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的对谈》,《清华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 [56]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17页。
- [62]周飞舟、何奇峰:《行动伦理:论农业生产组织的社会基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 [66]陈柳钦:《现代化的内涵及其理论演进》,《经济研究参考》,2011年第44期。
- [68]潘光旦:《优生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6~219页。
- [69]刘少杰:《寻求理性建构与传统延续的统一——关于20世纪中国农村建设运动经验教训的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 [70]唐亚林、周昊:《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演进、路径选择与价值追求》,《理论探讨》,2022年第5期。
- [71]李善峰:《乡村建设运动:一个社会学的考察》,《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5期。
- [73](美)埃弗里特·罗吉斯、(美)拉伯尔·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王晓毅、王地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9页。

作者简介:郭占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教授,陕西咸阳,712100;蒋晓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陕西咸阳,712100。

**Reconstruction of Ethics, Reconstruction of Trust and
Harmonious Rural Construction:
Rethinking Liang Shuming's rural construction Theory**

Guo Zhanfeng, Jiang Xiaoyu

Abstract: Liang Shuming believes that cultural imbalance is the root cause of China's social problems. He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ubjectivi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deeply excavates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local society, in order to cultivate new etiquette and customs, and form a new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integration form. Liang Shuming's rural construction thought tak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ics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ust as the driving mechanism, both of which aim to form a continuum from micro to macro by centering on themselves and promoting themselves to others. In practice, the two embed each other, forming a network of interwoven relations, and jointly promote rural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Liang Shuming's thought contains the development idea of taking human modernization as the core,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combining rational design and perceptual practice, and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realizing social modernization. Enlighten us to further think about the cultivation of farmers' subjectivity, the mining of rural ethical resources and the shaping of the overall concept of development in the current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farmers.

Keywords: Ethical reconstruction; Trust reconstruction; Modernization; Rural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邓飙)